

中文版第二十三期
一九九五年夏季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面向未來的聯姻

葡萄牙大發現文化中的中國形象

伊比利亞傳統的澳門紙牌遊戲

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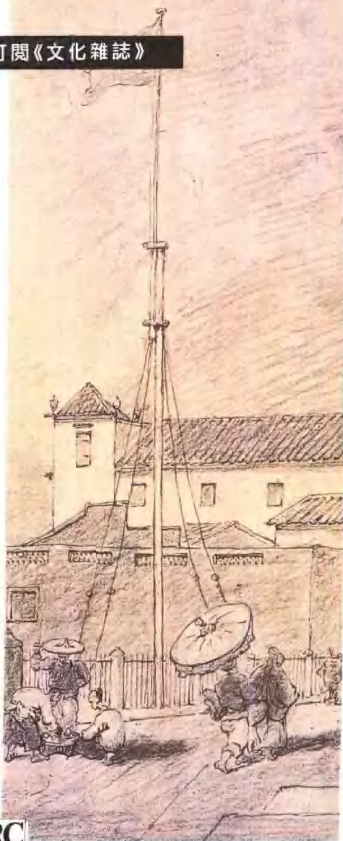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關心澳門請訂閱《文化雜誌》

澳門就是一部文化史冊
 它由兩個民族共同譜畫
 詩人作家和學者們視通萬里
 智慧與靈感令篇章妙彩生花
 歷史默默在字裏行間閃亮
 人文薈萃使精神熠熠昇華
 一頁接一頁請讀者細心瀏覽
 良師益友將為未來留下佳話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十三期
 1995年夏季
 每份定價
 澳門和中國大陸：60元（澳門幣或港幣）
 香港：80元港幣
 其它地區：1600士姑度/10美元
 全年四期訂價（包括郵費）
 澳門、中國—澳門幣或港幣200元
 香港—300港幣
 其餘地方—600士姑度
 38美元
 印數：3000



文化雜誌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主編

宮龍耀

中文版編輯 英文版編輯

黃曉峰 J. 巴斯度

中文助理編輯 葡文助理編輯

李淑儀 朱立豪

中文版校對 葡文版校對

鄭麗 E. 利馬

編輯部秘書 秘書助理

高麗達 施利華

美術主任 攝影

馬偉達 鄧麗珊 梁川

編輯部

澳門高炮島街27號二樓

TEL: 512280/5993110 FAX: 592002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新口岸海邊花園新安大廈87-B

TEL: 700391

代理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32號G

TEL: 308613, 338561 FAX: 314471

電腦植字排版

創款設計

印刷

國安印務公司



目錄



編者前言

官龍耀 3

· 歷史 ·

葡萄牙大發現文化中的中國形象	羅倫索	5
德·波瓦公爵在澳門	龍巴	11
關於廣州的最早描述	潘日明	23
謝清高與葡萄牙	章文欽	25
澳門諸名淺議	湯開建	29
伊比利亞傳統的澳門紙牌遊戲	阿馬羅	39

· 人類學 ·

澳門面向未來的聯姻	馬若龍	49
澳門土生葡人像冊 (1994)	鄧明威 尹清義	57

· 文學 ·

澳門世紀末的文學幻想	黃曉峰	87
論澳門土生文學及其文化價值	汪春	99

· 電影 ·

澳門：尋找失去的圖象	比納	111
澳門電影歷史：有聲影片時期	飛歷奇	117

· 藝術 ·

法奧斯特·桑巴約和澳門	馬蒂亞斯	187
菲格雷多畫評	菲格雷多	191

MACAU CULTURAL OFFICE
MACAU CULTURAL OFFICE
OFERTA
GIFT
贈品



封面說明

法國作家亨利·塞特蘭說：“民族如同個人，深受其記憶所苦。”很多時候，我們並非自己創造的我們，不過就是我們自身的尋常而已。而我們最好的鏡子，那面冷靜而現實的鏡子，鏡子總是他者。

由葡萄牙十七世紀中葉的一幅葡國人所繪，構成本期《文化雜誌》的封面封面，各圖從《職責圖》中抽取出來，是一卷彩繪中非常美的“人間萬物”，由乾燥呈黃下等繪製以瞭解其歷史情況的畫卷。

而十七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的風景種種，在《職責圖》的彩繪中乃是現實主義的，描摹出他們最繁華的輪廓，表現出他們繁榮的習俗特性，這些純粹的源型，馬若龍以其藝術的意圖與十七世紀現實主義的切點相連，出現了作者第11期的漫畫視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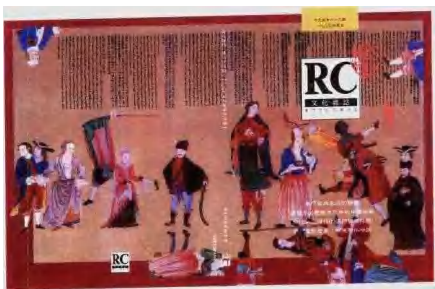
《文化雜誌》，第二十三期 第二系列夏季刊

論文作者：

羅倫斯
陳 三
黃仁明
章文欣
馮國強
何國輝
馬若龍
黃曉峰
王 華
杜 威
陳國治
馬若龍
菲洛特

本期《文化雜誌》對下列機構表示鳴謝：

- 澳門歷史檔案館
- 澳門中央圖書館
- 葡萄牙影視學院
- 葡萄牙、埃達斯、皮尼、特萊雅斯
- 阿曼尼、約翰、奧巴德
- 馬若龍律師



本期封面作者馬若龍



是一份研究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葡萄牙在東方的歷史，進而加強葡中兩兩之間的密切往來。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術價值，不拘政治見解；作者文責自負，其觀點和理論並不代表本刊立場。

雜誌編輯部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投稿。



是一份季刊，用葡、中、英三種文字出版，各文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略有增刪。有心的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在此，我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三種文版）的雜誌會更有參考價值。

編者前言

《文化雜誌》經過9年的努力才慢慢實現著初衷。一期又一期，我們從收集到的多種原材料中逐漸汲取養份。每一期的完成都像是一場戰鬥，幾乎是自我消耗的探險；掙扎於暗礁險灘，規避著定界極限。由於作品偶然性因素的限制，經常要原地踏步。那些慣常性的阻力總是與計劃的美好意願作對。

承蒙讀者善意而熱情的批評，讓我們依然不斷進步。《文化雜誌》因此才能逐步接近著它初始設計的理想藍圖。現在，這個藍圖的地平線已出現於我們的視野中了。

這篇前言不想作辯護，不想作證明，更不想乞求仁慈。我們在任何人面前均不會這樣。這篇拙文不是暗示任何苦痛的時影，不是顯示不滿，因我們拒絕任何供訴式的說明，拒絕主觀情緒的表露。我們在實際行動上有一種超越個人私利的設想，所有個人的苦惱都在作品更高級的營造中消解了。因此，我們的工作總是在基於為代理人、著作者和文化界人士提供謙卑服務的天職上而進行的。

我們祇是想合情合理而迎合時宜地留下記錄，並確認我們編輯原則和一種可付諸實踐的未來趨向，念念不忘我們從一開始就釐定的永恆職責，思索實現這個職責的可行性。

這是一片澄明之地，感受著精神的靈氣。這是通向自由之地，無論那自由實真價實抑或見仁見智，我們過去不會、將來更不會步入論爭的沙場。

然而，我們想要澄清的是，我們的宗旨從一開始就排斥那種被稱作“官僚文化”的特質。抗拒個人主義的直覺性，抗拒枯燥乏味和炫耀博學的天花亂墜，抗拒儼然而空洞的宏篇鉅製的虛假壯麗，抗拒與人類和自然的真實境況毫不沾邊的空想主義——我們是在時空的範疇裏記述著文化。我們要將自己置於一種設身處地的文化境遇之中。

我們是在東方並依賴東方的葡萄牙人，生活著，勞作著，同時夢想著“中國”。我們對未來的責任，是以我們對這塊土地和過去的根本性責任為前提的。

我們對古老的葡萄牙民族負有責任，正由於她給我們留下了海上探險生涯，結識了這東的國度和人民。

我們對這種歷史運動之目的性的思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要像阿爾加塞爾，基比爾（Alcácer Quibir）面對黃昏的黯澹那樣宣佈：“逝去吧，但

請慢慢兒來。”因為在澳門，我們體驗著被加強的因緣而認識到，我們之所以是葡萄牙人，因為我們是世界公民；我們之所以是世界公民，因為我們是葡萄牙人。

我們對偉大的盧濟塔尼亞人的祖國負有責任，這是語言上的空間，是生氣勃勃的泱泱大國的神聖園地。

我們對拉丁世界負有責任，這是葡萄牙品性包涵的“博愛之魂”的源泉，這個世界的遺產由於葡萄牙人的努力而留存至當今一代。

這表示我們對澳門開始負有責任。——澳門，這是加強認同性的小小單元，是求同存異的條件，是自主性和偉大中華的小小投影。她對中國的職責和價值將直接與她賦有的特性聯繫起來。

而面對中國，我們已在世紀之河的變遷中簽訂了一紙用血緣、精神和兄弟般互助情誼寫就的契約。

因為這一切，並以示範的名義，我們將那些空疏的淵博爭辯擱置一邊，那些爭辯將如許動聽的“東西方關係”化為空頭言論，卻既不能界定更不能瞭解彼此所使用的“關係”一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之，在儘可能為文化交流作實際貢獻的意義上，我們通過《文化雜誌》，致力於展示20世紀末葡萄牙文化運動中中國學研究的一部份情況，並以葡萄牙民族的方式，展示其在葡萄牙國民和拉丁世界品性中的作用。

澳門，那種被確認的文化橋樑的功能，在歷史上，在履行天職的意義上，越是可以利用，越是名副其實，就越能在國際上擴展其文化服務的效能。

因此，我們將會更加致力於為每一期《文化雜誌》賦予專門的使命。本雜誌始終以葡文、中文和英文同時發行。現在，根據信息傳播、擴充和分配的原則，我們將通過“國際信息交流網絡”（Internet）加速邁向國際化的步伐。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1995年夏季，我們對文化司署在9年前開展的這一文化舉措的潛力充滿信心，並確信在未來的歲月裏，本刊將辦得更加出色。

《文化雜誌》總編輯

官龍耀 (Luís Sá Cunha) 敬署



1995年8月1日

葡萄牙大發現文化中的中國形象

羅倫索*

1498年，葡萄牙人抵達印度之後，便開始同當時他們還不瞭解的許多地區和人民進行接觸，對於這些地區和人民他們所擁有的資料非常模糊混亂，有時甚至是完全錯誤的。

在隨後幾年，為了能恰當地將發現的新土地和人民納入他們的世界概念之中，葡萄牙人對亞洲大陸的地理和人類學進行了浩大系統的資料收集工作，並特別集中在其沿海地區，或直接同眾多東方地區接觸，或利用來自亞洲的口頭或文字資料。

這一大規模嚴格的資料收集工作，到1516年左右，除了許多零星文章之外，有兩部由16世紀葡萄牙學者編纂的全面描述亞洲地理狀況的巨著幾乎即將完成，一部是多美·皮爾斯（Tomé Pires）的《東方簡介》（*Suma Oriental*），另一部是杜阿爾特·巴波薩（Duarte Barbosa）的《東方奇覽錄》（*Livro das Coisas do Oriente*）。^[1]

在最早向印度進行的航海中，葡萄牙人所聽到約其中陸地之一便是中國，稍後通過加斯帕爾·科雷亞（Gaspar Corcía）所提供的證明，我們知道

丁加爾各答葡萄牙商站是在中國人的古老城堡支那科達（Chinacota）基礎上建成的。^[2]

加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在他的專論集中曾提到，這座城堡是15世紀上半世紀中國大規模征伐在整個亞洲海岸所留下的許多遺跡之一。^[3] 可能在這裏強調一下15世紀初葉術人和中國人所進行的遠征之間的共時性是很有意義的。根據奧爾塔所述，“中國人在這一地區航行已有很長時間”，“航行的中國船隻不計其數，霍爾木茲（Ormuz）居民在他們的書籍中曾記載，一次潮來，進入霍爾木茲島的帆船達四百多艘。”^[4]

兩年後，即1502年，一位不知名的葡萄牙地圖繪製師繪製了一幅被稱為坎迪努平面地球圖（*Planisfério de Cantino*）的地圖，並對當時在葡萄牙所有與東方有關的資料進行了系統的歸納，其中在靠近馬六甲附近一段註釋寫著“中國人之地”。^[5]

儘管中國當時祇不過是一個名字，但是對向絲綢和瓷器這樣珍貴物品的嚮往，開始激起了海外葡萄牙人的好奇心，因為許多跡象都表明了中國在亞洲政治和貿易全景中的重要性。因此，1508年4月

* Rui Manuel Loureiro，商科教育教師，東方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

迭戈·洛佩斯·德·塞奎拉 (Diogo Lopes de Sequeira) 在啟程赴東方時，隨其軍團帶去了要進行調查以期獲得對中國人形象最低程度瞭解的詳細的國王聖諭：

務必打探中國人，他們來自何方，有多麼遙遠，多長時間來一趟馬六甲〔……〕，帶來什麼貨物，他們每年有多少艘船來，船的形狀如何，〔……〕他們在馬六甲〔……〕有無商站和居屋，他們是不是富商，是否體質虛弱，是否是鬥士，是否擁有火器和大炮，他們穿著什麼衣飾，〔……〕他們是否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地域是否遼闊，他們之中是否有多個國王，〔……〕如果不是基督徒，他們信仰崇拜甚麼，他們有何風俗習慣，他們的疆域延伸至何方？^[1]

可以注意到引起人們興趣的方面指出了下述問題：貿易和商品、軍事潛力、人體外貌、政治組織形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地理範圍等。正如今天我們所說，這是一項大規模進行人類學考察的計劃。葡萄牙人用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才得以完成。1508年，儘管已有一些收集的跡象性資料，但有關中國事物方面的資料幾乎等於零。中國在葡萄牙人的地平線上仍是未清晰展現出輪廓的海市蜃樓。

從1509年洛佩斯·德·塞奎拉 (Lopes de Sequeira) 到達馬六甲後開始收集到第一批有關中國的可靠資料，因為在馬六甲港，葡萄牙人遇到幾艘中國帆船，同他們建立起友好關係。兩年後，阿爾布克爾克 (Albuquerque) 征服了馬六甲，加強了與馬六甲的中國人的聯繫。諾奧·德·巴羅斯 (João de Barros) 說阿爾布克爾克對他們“熱情款

待，非常樂於同他們交往，因其國王的權勢賦有盛譽，土地遼闊，軍力強大和富有，在他們接人待物方面看到了所聽說的某些方面。”^[2] 但我們不能忘記巴羅斯的視野已是在許多歷史事件發生之後，他所掌握的豐富資料在征服馬六甲時是不存在的。

在返回馬六甲時阿爾布克爾克隨身帶回一個華人，並將他送回葡萄牙。須特別指出這一做法證明了在葡人之間存在著一種對另一個文明民族人文特徵的特別好奇心。另外，阿爾布克爾克還精心寄送回一些中國物品，對文字資料所表達的形象予以補充說明：寄送給王宮一本中文書籍〔後來這本書由國王堂·馬努埃爾 (D.Manuel) 借著名的特里斯達·達·古尼亞 (Tristão da Cunha) 使團去羅馬時獻給了教皇里奧十世 (Papa Leão X)〕，還有一幅介紹南中國海岸的地圖，是由一份爪哇地圖轉抄的。

自征服了馬六甲，中國開始進入葡人航海的範圍之內。1513年第一批葡人抵達中國海岸：諸熱·阿爾維斯 (Jorge Álvares) 及其兩位伙伴來到廣東 (Cantão) 海域的一個名叫屯門 (Tamão) 的小島。1515年又一支由拉法埃·佩雷斯特雷洛 (Rafael Perestrelo) 率領的葡萄牙遠征船隊重新光顧中國海岸。首次同中國的接觸無論從經商還是從外交觀點上看都非常鼓舞人心，於是1517年便向廣州派出了由皮雷斯 (Tomé Pires) 率領的第一個使團。

選擇皮雷斯的依據除了這位藥劑師表現出可能具備的外交官素質外，還基於以下這一事實：即前不久，多美·皮雷斯在他的《東方簡介》一書中，為中國形象在葡萄牙文化中誕生做出了第一個重要貢獻。《簡介》傳遞的中國形象除了純粹節省文字上的修飾而進行的例行褒揚之外，並不特別具有價值。中國當時首先是一個重要市場，在那裡有可能進行獲取高利潤的商業交易。另外據載，皮雷斯為

這個王國的事物所具有的威嚴所傾倒，“人們會更加真正確信這些事物是在我們的葡萄牙，而不是在中國。”為此，他用了整整一個段落來探討征服中國的可能性；他認為獲得對整個中國沿海地區的控制相對較容易：“曾奪取馬六甲的印度總督率十艘戰艦即可征服整個中國的沿海地區。”¹⁹這表明當時的葡萄牙人對中華帝國的形象認識還十分不確切。

多美、皮雷斯的使團未能達到其目的，這位大使及其隨從都被捕了，同佛郎機人的關係正式中斷。這種局面一方面是由於葡萄牙人接觸中國文明時的專橫和缺少靈活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中國人所實行的排外主義和頑固的孤立政策。

使團一位成員克利斯多旺·維埃拉（Cristovão Vieira）從廣州監獄寫出了一封長信，並最終將其轉送到在中國沿海經商的葡人手中，另外還有一封當時被中國人抓獲的葡萄牙商人瓦斯科·卡爾沃（Vasco Calvo）寫的另一封信。這兩封自馬可波羅（Marco Polo）後以親眼所見描述中國的信轉送到歐洲，非常珍貴，因為克利斯多旺·維埃拉（Cristovão Vieira）是16世紀唯一一位成功將他訪問北京的消息傳遞到葡萄牙的歐洲人。這兩封信的資料價值可系統地分為三個不同的中心：

a）關於中國的詳細資料，特別是有關中國的地理、地方當局、經濟組織、商業潛力、戰爭人力與物力資源、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監獄和司法制度等等；

b）關於多美、皮雷斯使團及其使團成員命運的證明資料；

c）葡萄牙人試圖攻佔廣州，解救被俘人員的詳細計劃。

或許應該強調一下上述第三類資料，因為維埃

拉的信最後一部份和幾乎卡爾沃的整封信之目的在於鼓動葡萄牙當局對廣州進行軍事討伐。為此，信中包括了詳細的進攻計劃、敵軍要塞的位置、設防不嚴的地方、登陸的地點、戰略重點以及會加入葡萄牙人討伐的民眾之統計數字。總之，是一份真正的作戰計劃。葡萄牙俘虜們所處的絕望處境以及對中國現實明顯的錯誤估計，則清楚說明了葡萄牙人對兩封信中進攻中國南方地區的計劃非常重視。

這兩封信所描述的中國形象並無特別價值。我們僅來看一下從克利斯多旺·維埃拉信中抽舉出的幾個例子。

1）“中國官吏‘不愛民眾；他們只會詐欺錢財，殺人，用鞭子抽人，折磨老百姓。人民受到官吏的虐待，他們似地獄中的惡魔。從這裏可以看出人民不喜歡國王和那些官吏，他們每天都趾高氣昂，他們是一群盜賊。”²⁰

2）“每天他們都抓許多人，但釋放的人很少，許多人像動物一樣餓死在牢房中。這裡可看出人民仇恨官吏，他們希望新的事物，以獲得某種自由。”²¹

3）“人民如此順從和膽怯，不敢說話。整個中國的土地上都是這樣，比我所說的還要糟糕，因此整個民眾期望反抗和葡萄牙人的到來。”²²

在廣州監牢受了三年虐待之後，克利斯多旺·維埃拉自然不會特別預先準備讚揚中國。

在葡人出現在東方的前25年裏，所有的關於中國的資料之數量持續不斷地增加，但是中國的形象並未從眾多的地區中脫穎而出，對於葡人的利益而言，中國是一個潛在的貿易伙伴和一個可以定居的地區。

皮雷斯使團出使失敗的隨後幾十年裏，儘管受到官方限制，葡萄牙人仍繼續光顧中國沿海地區，同沿海居民進行半合法的商貿往來，以並在地方當

局的相對容忍下，終於在中國南部的島嶼上建立了永久的設施（寧波（Ningbo）和泉州（Quincy）是最具說服力的例子）。

1543年，幾艘葡萄牙商船意外偏離了沿中國海岸航行的正常航線，航行到了日本。利用日本和中國正式斷絕關係之機（1549），葡萄牙人很快成為這兩個強國之間貿易往來的中間商，由於馬六甲和日本之間的航程相當遙遠，急需在中國沿海地區找一個安全的中途停靠港，同時又可在這個港內同中國人自由地進行通商，正是這些活動導致在1557年建立了澳門，但是其開埠的具體情況今天並未完全弄清楚。我們僅知道1554年利奧內爾·德·索薩（Leonel de Sousa）同廣州當局就葡萄牙人與中國人之間進行貿易往來達成了一個協議，^①第二年，在澳門就出現了葡萄牙人一個臨時的機構。

根據最流行但沒有文字記錄的說法，澳門是為換取在抵抗侵擾中國南部海域海盜的戰鬥中尋求支援，而饋贈於葡人的。更可信的說法是通過向地方官吏行賄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使葡人的存在得以默認。但是如果說葡人特別對經濟方面的問題以及對在中國沿海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基地感興趣，那麼中國人也希望建立一個商業中心，以集中管理同外國的所有往來接觸。這樣做一方面可使廣州當局對人員和貨物實行有效監控，這一點對一個像中國這樣高度官僚化的國家來說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又可在一塊小小的便於監視的區域內允許有限制的同外國人接觸，這正是中國傳統的排外思想所需的。

自16世紀中葉日本的發現加速了葡萄牙人在中國海域的活動，同時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一方面，澳門迅速發展壯大，變成了東南亞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另一方面，開始真正挖掘有關中國的資料。於是，開始出現了許許多多曾在中國內陸坐過

監牢的葡萄牙商人（Galio'e Pereira, Afonso Ramires, Amaro Pereira）和當時出現在這一地區的耶穌會傳教士（Melchior Nunes Barreto, Fernão Mendes Pinto）寫的有關中國的記述。

在這些記述中，加里奧特·佩雷拉（Galio'e Pereira, 1557—1561）所寫《中國紀行》（Tratado da China）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著作。

他被所看到的一切深深打動，他談到中國的巨大和人口的眾多，公開讚揚中國文明現實的許多方面，特別是完善的公路和橋樑，無可非議的城市佈局，合理的生產結構組織（手工業、漁業、農業等等），地方管理的效力，司法機器的不完善等等。^②

隨著《紀行》的問世和半個世紀以來以親眼所見寫成的所有“資料”的出現，開始一個把中國社會評判為理想化社會的進程，這使得中國在葡萄牙文化中佔據了一個特別突出的地理位置，一個堪稱模範社會的所有形象（政治、經濟、技術、行政、司法，甚至文化等方面）都凝聚在中國身上。以至在16世紀後半葉一些最重要的文獻都可找到對來自中國的消息所產生的共鳴。我們僅舉兩個例子。

諾奧·德·巴羅士在他的《亞洲：第一個十年》（Ásia — Década I）（1552，第一版）中，已對中國文明公開讚美。“關於中國國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在土地、人民、權力、財富和軍隊方面遠遠超過其它所有國王。因為他的國家本身擁有15個省，他們稱之為都督，其中每一省都是一個巨大的王國。”^③巴羅士甚至還買了一個有學問的奴隸，讓他翻譯所獲得的中文著作。幾年後，在《第三個十年》（Década III）（1563，第一版）中，巴羅士更增加了對中國文化和文明的褒揚，並認為遠遠高於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文明，“誰真正看到中國的宗教，他們供奉神的廟宇，住在寺廟中的僧人，夜

以繼日的新講方式，他們的齋戒，他們的祭祀，對所有自然和倫理科學全面的學習，對各類科學的分級方式，他們防範行賄的謹慎，便會感覺到其文字遠比我們的古老，他們對國家的管理，整個冶金、製陶、木器、織布及絲綢機械裝置全都有文字記載，可以說在他們身上具備了希臘人和拉丁人受褒揚的所有因素。^[17]

加西亞·達·奧爾塔在他的《專論集》(Colóquios)中，表現出完全被中國所吸引：“中國人在商貿和機械行業方面非常具有才能；在文化方面他們也不比他人落後，因為他們有按普通法寫成的法律，還有一些非常公正的法律〔……〕；去中國的人會看到那裏所實行的公義和對法律的使用；授予文人以官階和稱號，是他們在統治著國王和國家。”^[18]有一次在中國的國王所提到的被稱為“蠻人”的魯亞若(Ruano)時，奧爾塔反應很快，即時答道，中國的國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個；若要談論他及其王國需要寫一本厚厚的書。”^[19]

中國這種高度積極的形象在16世紀後50年中專門從事海外事物研究的所有葡萄牙作者(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Gaspar Correia, Brás de Albuquerque, António Galvão, Damião de Góis, Cristovão da Costa)的視野中幾乎是一樣的，這種看法隨著克魯斯(Frei Gaspar da Cruz)的《中國見聞錄》(Tratado das cousas da China)的出版而達到巔峰，該書於1569至1570年間在埃武臘(Evora)出版，是第一本在歐洲出版專門論述中國的著作。^[20]

1556年，克魯斯在廣州生活了六個星期，他從親身經歷出發，同時又以在中國坐過監牢的葡人(他提到“一位貴族寫的一本教科書”，是指加利

奧特·貝雷拉)的口頭和文字敘述資料為基礎，編寫了他的《見聞錄》，這是對當時葡人所獲得的有關中國的所有資料進行的最全面的概述。

《見聞錄》的史料價值具有特別意義：這是對中國整個經濟、政治、行政、社會及文化生活第一次全面的描述，克魯斯精心挑選了中國現實容易引起葡萄牙讀者好奇心的所有方面。其描述從整體上過渡到各個具體方面，首先涉及中國的地理位置、行政界限及其劃分，談論到動物誌、植物誌，然後開始論述人類學方面的問題，例如外貌、服飾、烹飪習慣、節日、音樂、文字、信仰等等。應特別指出，《見聞錄》提到許多中國社會不曾被中世紀的史料學者瞭解的特點，例如：茶的利用、中國文字、古老的印刷術、長城、婦女裹腳的習俗等等。幾乎一直到今天，這些特點已經變成歐洲看中國的大主題。

除了作為史料來源之價值外，《見聞錄》構思之觀點也特別重要，因為克魯斯向我們傳遞了一個特別正面的中國形象，肯定中國物質和精神社會的多方面，甚至接受了中國的文明在某些特定方面的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這位多明哥派教士不斷讚美中國城市組織形式，道路和橋樑的質量，合理的利用土地，工匠的超卓技藝，某些廉潔的官員、低收稅，政府救濟等等。《中國見聞錄》的最後結束語坦率講是具有積極效益的：用克魯斯的話來說，“中國人在其人口的眾多，王國的遼闊、軍隊和政府的良好運作，以及資源和財富的豐盈上都超過所有國家。”^[21]

儘管《中國見聞錄》在其出版時發行量有限(在發生瘟疫的年頭出版，作者也死於瘟疫；此書以葡語寫成，這一語言在歐洲範圍絕少使用)，但也間接在整個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其史料

是由當時最大的兩家出版社進行宣傳的。一方面，克魯斯特的《見聞錄》成為著名的《大中華王國重要事件，禮儀和風俗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 (第一版，羅馬，1585)一書的主要史料來源，這部著作是由胡安·賈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所著(1585至1600年之間共出版近40版)。另一方面，《見聞錄》也是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在其《東方朝聖》(Peregrinação) (第一版，里斯本，1614年)中描述中國的主要資料來源。

結束語

可以肯定地說自1540年左右開始，16世紀葡萄牙史料總體上所傳遞的中國形象之特點一直是正面的。這一正面評價在當時葡人所到的其它任何地區都未曾有過。成為對16世紀葡萄牙文化裏中國形象的分析和確定其正面評價的理由，⁽¹⁾在我國的復興時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個文化問題，因為在我們所獲得的有關葡人對另一國家看法的史證中，除了關於海外社會人種特點累積資料外，我們16世紀的純正派作家思想的基本線條就像凝結在一面鏡子中的晶體。

【註】

- (1) 本文是安倫《自由年研究》(Estados Gerais Livres)刊物的一份同名文物的轉抄。里斯本，國立古代藝術博物館圖書館，1990年7月7日。出於教學方面之原因，註釋將縮減為只介紹要點。
- (2) 對這裏所涉及的問題有興趣、步驟解的讀者可參閱拙文《葡萄牙在尋找中國：形象與幻象(1498-1514)》(Portugal em busca da China: imagens e miragens)，《譯歷史》(Ler História)，里斯本，正在印刷，本文所提到的一些事件得到了恰當的依據和確證。
- (3) Almerida, AMAZAL Lopes de, 《印度傳說》(Lendas da Índia)，愛

爾蘭，普洛兄弟出版社，1975，第一卷頁185。所有引用的文章都已現代化了。

- (4) ORTA, Garcia de, 《印度平民和毒品等論集》(Códig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Índia)，托卡路伯野出版，里斯本，國立制幣廠出版社，1987，第一卷頁204-205。
- (5) 同上。
- (6) Mota, Avelino Teixeira de, Cortesão, Armando, 《Portuguese monuments cartographic》，里斯本，1960，第一卷，第5。
- (7) Albuquerque, Afonso de, 《阿豐索·德·阿爾布奎爾克的手稿》(Cartas de Afonso de Albuquerque)，R.A. Balthão Pinto and H. Lopes de Mendonça出版，里斯本，科學院，1884-1935，第二卷頁416。
- (8) Barros, João de, 《路德·德·巴羅斯的亞洲》(Ásia de Barros)，第二個十年，第六冊第二章。我使用了《路德·德·巴羅斯和迭戈·多·高托的亞洲》(Da Ásia de João de Barros e de Diogo do Couto)複製本，里斯本，1778-1788，聖·卡洛斯書店，1973-1975，第24卷。
- (9) Cortesão, Armando, 出版多美，皮爾斯頓的《東方簡介》(Suma Oriental)，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78年，頁252。
- (10) Cristiano Vieira and Vasco Calvo的《書信》在提供一段時間內僅可進入Donald Ferguson 罕見的出版物內，《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孟買，1902。最近由DINTINO, Raffaella發表《中國見聞史料：16世紀的文獻》(Informação das coisas da China: textos do Século XVI)，里斯本，國立製幣廠出版社，1989，頁3-53；現代譯本是由我負責，有Albuquerque, Luís de, Loureiro Rui Manuel, Pericó, Maria da Graça出版的《中國與西羅見聞錄》(Noticias da China e do Tibete)，里斯本，阿爾法書店，1989，頁7-64。我有一本對這些信的評論集正在出版中。
- (11) Albuquerque, Loureiro; Pericó, 以引用著作頁30。
- (12) 同一著作頁33。
- (13) 同一著作頁38。
- (14) 引用我的文章《中國廟上的一位阿爾加維人：雷奧內爾·德·索薩(1554)》(Um agavio nos mares da China: Leonel de Sousa (1554))，《澳門海軍研究中心報》，澳門，印刷中。
- (15) Galiste Pereira的《見聞錄》(O Tratado)最近由DINTINO, Raffaella發表，引用之著作見第97-129，Albuquerque, Loureiro, Pericó著作的現代版本由我負責，《葡萄牙有關中國最早記載》(Primeiros escritos portugueses sobre a China)，里斯本，阿爾法書店，1989，頁9-49。
- (16) Barros, João de, 引用著作《第一個十年》第九冊，第二章。
- (17) 同一著作，《第三個十年》，第二冊第七章。
- (18) ORTA, Garcia de, 引用著作，第一卷頁260。
- (19) 同一著作，頁159。
- (20) Raffaella, DINTINO最新出版的《中國見聞錄》(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引用著作，第147頁至254頁；Albuquerque, Loureiro, Pericó的最早記載，頁50-186。
- (21) DINTINO, Raffaella, 引用著作，頁155。
- (22) 本文是我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

崔維孝譯

德·波瓦公爵在澳門

1867年2月

盧德維奇·德·波瓦(Ludovic de Beauvoir)於1846年生於布魯塞爾，父親德·波瓦侯爵同奧爾良家族關係密切。於1848年革命推翻的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國王，即為該家族成員。盧德維奇青年時請求學期一結束，雖然還剛剛二十歲，便決定隨皮埃爾·菲力浦，讓·馬里也即德·薩埃弗爾公爵(Duc de Penthièvre)，一起去周遊世界。德·龐蒂埃弗爾公爵(Prince de Joinville)乃路易·菲力浦國王的孫子，父親昂布爾瓦·費爾迪南·德·奧爾良(François Ferdinand d'Orléans)，也即茹安維爾親王，於1843年回巴西國王之女弗朗索瓦茲(Françoise)成親。兩年後，即1845年，德·龐蒂埃弗爾公爵誕生於聖克盧(Saint Cloud)(可見他祇比盧德維奇大幾個月)。由於母親的葡萄牙血統關係，他常被人稱作“葡萄牙國王的表弟”。此點文中將會談到。

兩個年輕人於1866年4月啟程，所到之處有澳大利亞、爪哇島、暹羅、香港、澳門和廣州，接著還到了中國北部、日本和加利福尼亞，最後於1867年9月回到法國。自1869年起，盧德維奇·德·波瓦相繼出了兩部遊記，一部題為《澳大利亞》，一部題為《爪哇、暹羅和廣州》，獲得很大成功，曾多次再版。1870年，他參加了對抗德國的戰爭，後於第三共和國成立初期進入外交界。1876年任外交部長德卡茲公爵(Duc Decazes)的辦公廳主任。1872年，他的第三部遊記《北京、東京和舊金山》問世，獲得同樣成功。三部遊記後來榮獲法蘭西學院獎。

兩位青年旅行家於1867年2月抵達澳門，受到澳門當局的热情款待，為方便其遊覽，總督堂·約翰·馬利亞·德·羅特·豪塔(Don José Maria do Ponte Horta)為他們提供了一艘小艇，他們因而得以遊遍當地名勝，如南灣、望廈、市政議會、炮台、教堂、網球場。此外當然還去看了賈梅士祠，並在洞穴外看到了法國人路易·里安齊(Louis Rienzi)所寫題詞……。不過真正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參觀了往海外販賣中國苦力的“高欄”(Barracons)……。這種曾給當時的澳門帶來滾滾財源的不光彩“交易”，今天似乎已被人完全忘卻了。

——德立·龍巴 (Denys Lombard)

第十三章 澳門

海盜橫行—澳門的葡萄牙風光—劇院—賈梅士洞穴—參觀販賣中國苦力的“高欄”—殖民地的繁華往昔和今日的顯耀—夜抵水城廣州

走出國際賽馬場，我們登上了美國雙層輪船火

梭號(Fire-Dart)，前往澳門。船上有六百來個中國人，他們都帶著妻子，密密麻麻地擠在艙艙裡。為了禦寒，個個穿著厚厚的棉襖，身子蜷成一團，有的吸起鴉片來，神色十分安祥。他們的性情似乎並不總是那樣溫和。歐洲人運送“天字公司”(Celestials)的貨物，一向要冒很大風險。這家美國公司已有三艘船落入海盜之手，船上的乘客同那些

海盜是一伙的，船長和船員不是被他們殺了，就是被他們捆了起來。

後來，我們的輪船駛入“硫磺地峽”（Sulphur Canal），見到的島嶼有大嶼山（Lantau）、蘇安島（Chung）、巴頓島（Patung）和西科島（Siko）。一提起這些地方，至今令人不寒而慄。這一塊狹長海域共有九個島嶼。“阿拉通，阿斯卡號”（Arratoon Apar）（歐洲人死了十一個），“皇后號”（Queen），“永新號”（Wing Sun），就是在這兒被海盜截住，放火燒掉的。1865年，在此遇難的最後幾艘船是肯法號（Cumfa）、北極星號（North Star）、希科號（Chico）、和安德烈號（Andreas）。一艘倒楣的歐洲輪船，往往受到三十來艘小水船的圍攻。殘酷的殺戮，令人髮指。海盜們先是圍著它一陣射擊，使之不得不在航道上停下來。隨後，他們便會攀爬上來，把船上的所有無辜統統殺光。至於船上的貨物，他們自然會毫不客氣地全都搬到小船上。這之後，他們便放起火來，

使整個船體連同桅杆一起沉入海底。水下至今躺著的那些殘缺不全的船隻，便是這無恥行徑的見證！因此火燒船上之水手，從尚未成年的練習生到機械長，身上全都帶著手槍，十分引人注目。在頭層艙和統艙裡還架著可遠距離射擊的槍位，這些槍的槍口並沒有對著海面，而是這樣放置的：祇要船長一聲口哨，每枝槍就會對著艙內猛烈地平掃起來。再有一聲哨響，全體船員便會在剎那間集中於甲板前部的桅杆下。因為一旦遇到來自外部的襲擊，首先要除掉掉的，便是船上那些來自本地區的乘客。沒有他們必不可少地接應，海盜對我們的船是絕不會貿然行事的。海盜要襲擊一艘輪船，所動員的人定會很多。其結局，讀者從上文所談可見一斑。而要襲擊一艘帆船，則主要是看準機會下手。海盜們常常煞有介事地在那裡擱魚，一副安然的神色。但一發令下，各條漁船便會飛速而來，把帆船圍得嚴嚴實實。這時候，這可憐的帆船無論速度有多快，也無法逃脫一場浩劫了。



我們遇到鑲金寶的匪船。一個中國青年抓住帽子嘔吐大哭，鮮叫不止。

「今天諸地，這艘絕人資的船在北海戰艦司望見前，我們卻總算沒有遇到。船上的中國東家整天抱著一杆鴉片槍，一副無精打采悠然自得的樣子。晴空萬里，香港澳門間星羅棋佈的小島犬牙交錯，曲折的港灣盡收眼底。狹窄的航道中，前方突然出現幾艘小木船，小木船的船頭都畫著一隻很大很大的眼睛，顯然是希望上蒼能保佑他們出海平安的一種迷信之舉。每條船的船首都架著三枝槍，左右兩側也各架了三枝，船尾還有三枝，一眼便可看出，這些出生入死的漁民都非常地聰勇。高高突起的甲板上，生活著他們的全家。他們生在船上，結婚成家也在船上，死也在船上。五代人就這樣雅然無旁地擠在這狹小的天地中，這些船隻都設計大膽，造型優美，外表塗著想來豐富的圖案，甲板上飄揚著鮮艷的旗幟和五顏六色的彩帶。但從船口和船尾的窗口看進去，船內我們的細全是些破爛，比之於華美的吟哀，實在宛如天壤！一看到我們的火機銃，成百上千的人立即從每條船的船口走了出來。水面上，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不知是出於高興還是有意炫耀，有的人起勁地敲起了鑼鼓，有的人燃起了鞭炮，隆隆的炮仗聲往回四面八方。」

不過，這些簡陋的木船，也不是到處都賴其原始，沒有任何可取之處。相反，這些工藝正處於萌芽和發展之中。中國人都是些蠻人（現在讓出我們把這個稱呼回贈給他們），我指的是，他們只是在季風刮起來後，才會借助風勢揚帆出海，然後等上五個月，待另一場季風刮來，才踏上歸程。他們那厚厚的簾狀帆，由五根橫向的竹竿沿帆布表面把帆攔得非常平，顯得非常笨重，但他們的船卻做著小巧而又精緻，這艘就懸掛在一特軸上，可隨所需壓力



這畫出我們的多爾多，這艘Don de Fago 號出現，有100名150名從各艘中式帆船的船裡出來

大小而上下移動，舵手僅憑一根長長的木棍進行操作，就可以奇巧的操弄而使其所得到的力量增大五倍。中國人並發現，若在阻遏水流的木柱上開挖一些菱形小洞，則其阻水力將比整塊木板大得多。因為從前的水流此時將會旋轉著爭先恐後地流過那些小洞，這種你爭我奪的結果會使舵的阻力更為增強。

經過三個半小時的航程，我們也就到了慈仔（Taipa）鉅地附近。葡萄牙海船，整個澳門半島終於映入我們的眼簾。葡萄牙酒樓在豪家上空颯風飄揚。這裏繁榮建在陡峭的懸崖上，俯瞰著怪石嶙峋的大地。你想，這陡峭懸崖總有七八處之多。懸崖上方是用紅花崗岩堆砌而成的雄偉，光禿禿的山頂一個接著一個，高出海平面二百來米。屋頂呈有圓式平台的房屋為次櫛比，有的漆成藍色，有的漆成灰色，有的漆成紅色。聳入雲天的教堂鐘樓共有十來個。每幢房屋的窗戶上都裝著鐵條。城內各個街區呈圓錐狀，一條條街道方陣，僅有兩米寬的小巷蜿蜒其間。山城腳下是一個半圓形的港灣，港灣裡停泊著幾千條小木船。這就是澳門！

我們於是登岸，碼頭上搖搖苦力。沿山勢而建的高樓斜巷（Calçada de Bom Jesus）和「巴拿間斜巷」（Travessa do São Agostinho），帶有典型的葡萄牙特色，狹窄的街道兩旁是用花崗岩砌成的平房，看去略似一座座廢鐵。這狂風肆虐的這座城市，居民成份相當混雜。阿爾布克爾克（Albuquerque）的後裔，有的帶著戰刀，有的脖子上圍著圍巾，走在街上成群結隊，步履遲緩；他們是葡萄牙人和中國人的混血兒，而那些中國人原來已帶有馬來人、印度人和黑人的混雜血統。總之，他們身矮矮小，顯得相當瘦弱。淺褐色的臉膛上，長著兩隻大大的杏仁眼。他們就生在這半基督教半巫術，也即半文明半亞洲型的社會中！城裡有兩家英美式小旅館，我們在昏聩的弄堂裡走了好久之後，總算在其中一家找了個棲宿之地。旅館好似一座沒有窗戶的鐵倉，不但潮濕，而且臭氣熏天。難以數計的蟑螂已先我們一步，在這理安營紮寨。

不過對我們說來，這頭熊祇是一個臨時住所，因為我們總有可能找個好一點的。北方合眾國（Etats-unis du Nord）當年曾派我國佔領墨西哥而與我國的關係相當緊張，一場戰爭眼看就要爆發，面對這一情況，德·龐蒂埃弗爾公爵帶著深潔的遺憾辭去了他在聯邦的海軍職務，否則戰火一開，他將不得不參加到反對自己國家的戰爭中

去，然而他當時不想就此離開海軍，因此到他的表兄葡萄牙國王的海軍中謀了個軍階相同的職務。此後，他第一次出征是在唐璜（Don Juan）戰艦上。第二次出征，時間為一年半，他以海軍中尉的身份登上巴特龍科·迪阿茲號（Bartholomeo Diaz）輕型巡艦，到過非洲海岸、里約（Rio）、蒙特維多（Montevideo）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他現在仍屬葡萄牙海軍，此次出來只是暫時離開，因此仍可享受一個葡萄牙海軍軍官所能享有的全部便利。他因而於當天晚上給澳門總督寫了封信。

我們住的地方實在應有盡有，為了避免蟲蟻的騷擾，我們讓旅館老闆找了一個中國苦力，帶我們去中國劇院看看。因為天黑之後，中國戲院是該城唯一的消遣去處。山城的每一條街，都要爬上爬下，石砌階梯旁果然掛著標有本街道名字的告示牌。走在這樣的地方，我覺得自己簡直成了猿猴。後來，我們總算進到一幢喧鬧不已的木頭房子里。大廳兩邊擺著一排小桌，每桌坐了四個中國人。他們正在那裡吃著，喝著，有的還抽著煙。我們在前排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舞台上正在上演一齣插入雜耍的戲，這場戲自上午十時開場，現仍在繼續中。可是，由於聲光太過嘈雜，我們捂住耳朵，對這場對人味味的戲剛看了約一小時，戲場裡忽然一陣騷動，桌椅板凳被打翻在地，黑壓壓的一幫人從門外擁了進來。場內的人亂哄哄地紛紛給他們讓道，發生甚麼事了？進來的幾位不速之客中，有幾位是總督的副官，還有一位是輕型巡艦艦長，他們全都穿著正式的禮服，帽子上插著羽翎，胸前掛滿勳章。這個陣勢自然非同尋常。由於戲場裡只有我們兩個歐洲人，穿著又非常隨便，場內的中國觀眾隨即交頭接耳，甚至大聲鼓噪起來，斷定這些人定是來抓我們的。不料卻見這幾位先生十分謙恭地走到公爵面前，向他轉達了總督的問候，邀請他往總督府去。如果接受邀請，我們將不得不冒著黑度的寒氣，在那一條條小弄堂裡再走一遭，剛才還冷冷清清的劇院門前現已聚集起許多人，這表明我們今晚非同尋常的出現已經激起各家各戶的濃厚興趣。因此，經過非常客氣的交談，雙方最後約定，我們還是明天中午去拜訪總督。

考慮到一旦進入總督府，由於接待隆重，我們作為一個旅行家將難以再有甚麼真正的發現，為了利用我們在澳門這最後一點自由自在的時光，我們立即精神抖擻地帶著那位苦力，又到了中國人所聚居的街區。這裡環境整



所有出入口都充滿中國人，四人一小桌吃，喝，抽煙。

潔，茫茫黑夜中點著的各色燈籠，十分迷人。該城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賭場，因為澳門有天朝的摩納哥之稱。海南、廣東和福建的中國富人常會不惜一切地跑到這兒來，在“三十和四十點”賭局（此賭法在他們家鄉是禁止的）上，把錢輸得精光。主持賭局的莊家是一位年已花甲的老者，銀白的辮子垂於腦後，指甲留得很长，幾根稀疏的鬍鬚閃閃發亮。四周下注的賭客竟達幾百人之多。

時近午夜，祇見那些中國人身上穿著絲綢，走在路上，每人都提著個大紙燈籠，樣子很是奇特。我們對自己今晚這趟賭場之行深表滿意，於是讓身邊那個苦力帶我們回到那家蟑螂成群的旅館。不知道這可惡的“天朝人”（Celestial）是否因為見那幾位副官都穿著筆挺的制服，而認為我們身上一定帶著不少錢，他有意把我們帶錯了方向。路邊的房屋越來越少，我們已在不知不覺中來到荒郊野外。我們倆不安地互相看了一眼，因為眼前所見之物，除了茅叢和水塘，甚麼也沒有。原先的大路也已變成一條羊腸小道。與此同時，在一百米開外的地方，六個中國大漢正不緊不慢地跟著我們。我們在彎彎曲曲的小路上漫無